

从新发现的资料解读英敛之的早期思想^{*}

周萍萍

清朝末年，国势衰微。面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有儒学背景的英敛之选择加入了天主教。本文以长期为学界所忽视的报刊《益闻录》中所载英敛之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其早年护教思想和爱国爱民的情怀。对英敛之早期思想的认知，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后来的种种举措，如积极创办《大公报》、直接参与到历次抵御灾害和赈济灾民的社会活动，以及努力筹建中国公教大学、大力推动中国教会的本地化等。

关键词：英敛之 《益闻录》 天主教 护教

作者：周萍萍，1972年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目前学界关于英敛之的研究，多集中于1900年之后其在宗教、文化、教育、慈善等方面的贡献及影响，鲜有涉及1900年之前^①。即使是治中国天主教史的大家方豪先生的《英敛之先生年谱及其思想》一文，对1900年之前的英敛之亦着墨不多。这主要因为在1900年之前，英敛之的大部分作品都零散发表在各种报刊上，多数都没有收入其文集，故而学界对此几无关注。笔者有幸在上海图书馆所藏报刊中找到一批英敛之早年发表的文章，希冀这些资料能够为学界研究提供帮助。

英敛之，姓英名华，字敛之，号安蹇斋主、万松野人，赫佳氏，正红旗人。1867年生于北京，1888年领洗入天主教，1926年去世。《清史稿》载：“（英华）博学善诗文，工书法。著书立说，中外知名。”^②1902年，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作为宗旨。而在《大公报》创办之前，英敛之的文章大多刊登于天主教会在华创办最早的中文报刊《益闻录》上，这些文章充分体现了其早年护教思想和爱国爱民的情怀。

《益闻录》的创办人是天主教神父李枋。李枋原名李浩然，字问渔，号大木斋主，圣名劳楞

*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末民初中国奉教知识分子的信仰磨砺——以英敛之为中心的个案研究”（11BZJ017）的阶段成果；同济大学“欧洲哲学与文化研究”项目资助（编号102110）。

① 如方豪《英敛之先生创办〈大公报〉的经过》，见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侯杰《〈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Donold Paragon “Ying Kien - chih (1866 - 1926) and the Rise of Fuge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Monumenta Serica*, 1961等。

② 《清史稿》四四册，卷四八六，列传二七三，文苑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436页。

佐，江苏川沙（今上海浦东）人。李问渔出生于天主教世家，自称“自先祖奉教以来，业已八世。”^① 1862年，李问渔毕业于耶稣会创办的圣依纳爵公学（徐汇公学），入耶稣会修道；1869年晋升为司铎，先后传教于江苏松江、青浦、南汇（以上地名均在今上海境内）和安徽建平、宁国等地；1878年回沪后，创办了天主教会在华出版发行的第一份中文报刊《益闻录》。该报设有“恭录上谕、教皇谕旨、西报摘录、申新两报摘录、文苑”等栏目，发行面不局限于教内，对时人了解外面世界、接触西方文化起到一定作用。自1891年起，英敛之开始在《益闻录》发表文章，至1898年前后共有近百篇文章，它们充分反映了英敛之的早期思想。

英敛之虽是旗人出身，但是家世并不显赫，其自言“仆家世微寒，先代无达者，生长陋巷，耳目所逮，罔非俗物。”^② 受满人擅长骑射的影响，英敛之早年曾习武，“不屑于雕虫篆刻”，但是20岁左右却成为其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他开始弃武从文。从诸子百家到稗官小说，他无不浏览。由于贫困坎坷的影响以及古今群书的熏陶，他目睹当时国家衰败、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不由得愤世嫉俗。那时，英敛之结交了一帮朋友，常与他们“酒酣耳熟，相与抵掌谈天下事。遇奸贪误国、豪暴虐民诸行为，未尝不发指眦裂，痛恨唾骂，为之接墙终宵也”^③。面对外侮频加、国家整体昏聩愚昧、习武已经“见遗于社会，无补于身家”的境况，英敛之苦苦思索如何才能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这之前，英敛之读过一些儒家典籍，他曾提及“仆幼时粗解文字后，读《儒门法语》中陈白沙先生《禽兽说》，即颇知警惕”^④。《儒门法语》为清朝彭定求所编，录入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陈白沙则是元代以后程序化的朱子学向明代的学术主流——阳明学过渡的关键人物，他在《禽兽说》中提出“人如无志，将与禽兽无异”。陈白沙的观点颇契合英敛之的心意，因为他一直苦苦追寻“道”、“理”之所在，以致“独皇皇然以求道为己任”^⑤、“富贵功名不动心，每于至理癖思沈”^⑥。

与当时的趋新士人一样，感时忧国的英敛之察觉到维护中国政治道德秩序的儒家学说欠缺实效，因此一度转向佛道，“几听庄老几参禅，说静说空时复年”^⑦。确实，近邻日本的迅速崛起使部分文人认为信仰佛教也可以使中国步入近代化，佛教与西学有相通之处。然而，英敛之在佛道中仍然没有找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一心要打破心中疑团却寻找不到途径的英敛之内心非常焦虑，“我生不肯糊涂死，毕竟如何是悟时？”^⑧ 在传统的儒释道中没有找到拯世救国的良方后，英敛之转向了西方文化。当他接触到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著述后，“读之既久且多，因多而疑、而问、而思、而辩，弗嫌弗信，信岂苟然已哉”^⑨。

1926年英敛之去世后，其学生徐致远在《英敛之先生行迹》一文中曾提及英信奉天主教的经过。大意为“里人有德津者，日相过从，乃介之于耶稣教；观其书，察其礼，有意焉。德又介之于天主教，觉尤甚。乃往西堂，时教士为法人艾公，一见欢甚，曰‘少年好道若此，可喜也’。自是质疑问难无虚日。又得汤若望《主制群微》，朝夕玩之，如获至宝。久之遍觉明季清初译籍，始于圣道毫无疑义。”^⑩ 由此可知，英敛之接触到基督宗教是受邻居的影响，但他并不是盲目信从，而是反复前往位于西直门的天主教西堂观察、问道。当对天主教教义教理有了一定

① 李问渔编《理窟》，上海慈母堂，清光绪12年（1886）铅印本，序。

②③ 英敛之《金锡侯君年谱叙》，见《也是集续编》，天津大公报馆，清宣统2年（1910）。

④ 英敛之《陈白沙先生论书法》，见《蹇斋剩墨》，石印本，1926年。

⑤⑨ 马相伯《万松野人言善录序》，见英敛之《万松野人言善录》，天津大公报馆，1916年。

⑥ 英敛之《前意未尽再成一律》，载《益闻录》，1892年7月23日。

⑦ 英敛之《写怀四律有序》，载《益闻录》，1892年8月13日。

⑧ 英敛之《有疑》，载《益闻录》，1892年7月23日。

⑩ 徐致远《英敛之先生行迹》，见《中华公教青年会季刊》，1929年第1期。

了解、心中的困惑得到解决后，英敛之才决定领洗入教。他在诗中言明心志，“自此打破疑团后，圣域贤关可漫寻”；“原始要终真究竟，一心归主复奚疑”^①。

可以说，是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所著书籍打开了英敛之的心智，特别是汤若望（Adam Schall，字道末）的《主制群微》更使他心有戚戚。后来，英敛之努力搜求教会先贤遗著，与友人共同考证，撰序印行，广送各界社会人士，以求他们能够对天主教多一些认识，逐步改变对教会的看法。因为英敛之对汤若望尤其推崇，故1915年重刊《主制群微》时他特意请马相伯为之作序。而早在此之前，他就曾在《题道末先生集》一文中表达了对汤若望的尊崇，其文曰“寻常爱读汤公语，今日开编恍遇君。我友为之尤感切，几回约我哭君坟。”^②

二

英敛之所处的时代，民教冲突时有发生。据统计，从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得以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到1899年的40余年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大大小小1500多起教案。教案频发的主要原因是传教活动有帝国主义强权作为后盾，这激发了中国人民的仇恨与反抗，因此中国文人群体普遍对天主教抱有敌视态度。在这样的反教氛围下，有儒学背景的英敛之却被天主教所吸引，选择了加入教会。他做出如此选择是因为视天主教为护佑国家摆脱困厄、转危为安的济世良方。正因为如此，成为信徒后的英敛之积极护教，努力通过文字的形式为天主教辩护，以消解社会人士对天主教的误解。英敛之在《益闻录》上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极好地反映了其护教心态。

1886年，李问渔神父将《益闻录》自创刊八年来所刊载的关于“教中要旨”的三百余篇文章就简删繁，仅留一百余首，汇编成《理窟》一书，由上海慈母堂铅印出版。“理窟”意指“义理的渊数”，北宋哲学家张载曾著《经学理窟》一卷，李问渔神父可能是效仿之而编此书。在《理窟》序中，他指出“夫教以理为本，理之曲直，教之邪正所由分也”，希冀“阅是书者，会其理而略其词，则崇正绝邪，肇端乎此”^③。李问渔神父在书中论述了“主宰论、耶稣传、天主教论、儒教论、道教论、佛教论、异端辨、敦俗说、魂鬼论”等内容。

领洗入教后的英敛之阅读了《理窟》，并于1891年作了一篇名为《辛卯冬夜读〈理窟〉辩诬章有感时事援笔为长句如左》的文章，刊登于1892年的《益闻录》。该文主要是英敛之针对《理窟》中的“天主教被诬辩”条有感而作。“天主教被诬辩”条是李问渔把社会上流传着的各种反洋教揭帖，如“天主教以修身为名，实则集聚成群，谋为不法”、“教士挖眼剖心，用为迷药”、“在教之人，皆非善类”^④等汇集在一起。揭帖的矛头直指教士、教民以及天主教堂，英敛之读到这些内容后不免心生感慨，进而挺身为教会辩护。

因为英敛之自幼“笃好理学”，传统文化的功底较好，因此他为天主教辩解时用典娴熟，可谓信手拈来。文中英敛之相继用了周公、乐毅、巷伯孟子、颜子、曾子等遭诽谤、被冤枉的典故，比附天主教被诬枉恰是“一言毁败何须两”。同时，他用贤人颜回早夭、恶人盗跖年长、岳飞蒙冤、秦桧遗臭等典故，来比附教案中遇难的信徒。他对这些信徒充满怜爱，称赞他们道：“无妄灾来惟顺受，成仁取义志颇坚。爱仇奇行体大造，为彼犹为求主怜。”^⑤

① 英敛之《有疑》，载《益闻录》，1892年7月23日；《写怀四律有序》，载《益闻录》，1892年8月13日。

② 英敛之《题道末先生集》，载《益闻录》，1891年1月28日。

③ 李问渔编《理窟》，上海慈母堂，清光绪12年（1886）铅印本，序。

④ 李问渔编《理窟》，卷三，第24页。

⑤ 英敛之《辛卯冬夜读〈理窟〉辩诬章有感时事援笔为长句如左》，载《益闻录》，1892年2月17日。

1892年,《益闻录》连续登载了英敛之的《覆鉴翁先生辨学第一书》和《覆鉴翁先生辨学第二书》两篇文章,主要是英敛之针对鉴翁^①先生先后两封来函中的问难而作的解释。在《覆鉴翁先生辨学第一书》中,英敛之认为鉴翁之所以对天主教有诸多误识,“皆由足下阅书未全、闻理不澈,故更有教中教外一端云云”,因此推荐了几部天主教书籍让鉴翁阅读,所荐书中有《理窟》,可见他对该书还比较推崇。英敛之希冀鉴翁“反复批阅,明辨慎思,字斟句酌,自能洞识是非、心领神会”,自己就不用再“浪费笔墨、鼓舌摇唇矣”^②。

然而,鉴翁并没有为英敛之的言论所打动,可能也没有阅读后者所推荐的书籍,因此继续发难。在《覆鉴翁先生辨学第二书》中,英敛之针对鉴翁提及的天主教与回教、佛教相似的观点,作了如下回复“至谓我教与玛哈墨教相似,此言失之率尔。愚勿庸辨其果否与回教相同,阁下试平心思之,其能比吾圣教万一乎?阁下又谓告解圣事与村姬念佛免罪之见正等。此则大谬不然。”英敛之认为鉴翁“未读告解要理之书,未沾告解圣事之恩”,因此才会有这样的议论。他详细解释了天主教告解与佛教烧香拜佛的不同之处:首先,佛不可与天主相比,“夫佛乃负气之侔,非造物大主。向之礼拜求赦,何异躬犯王章,求免于乡人,皆知其不可。赏罚之权,操之天主。人向之、求之、为礼之,当然”;再者,天主教告解的形式与佛教截然不同,“况告解之端,要务有五,即省察、痛悔、定改、告明、补赎是也。五者缺一不可”^③。

1893年,《益闻录》刊登了英敛之的另一篇护教文章《初使泰西记辨》。《初使泰西记》的作者是志刚。因为“笃实恳挚,器识宏通”,1867年,志刚被选作使臣派往西洋各国。回国后,他将所经历的见闻写成该书。1874年,志刚解甲归田,隐于玉泉山下养水湖。其时英敛之经人引荐认识了志刚,并成为忘年交,经常与志刚“扬榷今古、抵掌是非,且叨承缪许”^④。1884年,志刚重新校订《初使泰西记》,英敛之参与了校对工作。

出于对清政府的维护和对教会的误识,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有许多指责基督宗教的言论,如“教案系由教士引起”篇表明了其对扬州教案^⑤的态度。当时,志刚正出使英国,在报纸上看到扬州教案的经过后,指出“若外国传教士不查良莠,袒护匪徒,欺压良民”^⑥,中国自然是会秉公处理的,言下之意这一切都由教士自己行为不端而引起。再如“驳斥对中国的污蔑”篇,志刚针对外国人询问的“中国何以残害子女,不但不为抚养,反以之供猪狗之嚼啮”加以反驳,认为这是无良传教士为骗取本国钱财而捏造的说法。志刚列举了一些传教士在华的种种恶劣行迹,如“教士在中国诱人习教,招聚地方无赖之徒,倚势行强。名为劝人为善,实则代人扛讼、抗债、霸产,欺压善良,侮慢官府。甚至结深仇,犯众怒,激而为烧杀拆毁。而教士则拼性命以博中国数十万之赔偿”^⑦。

英敛之与志刚交往、参与校订《初使泰西记》时并没有信教,因此读此书亦不以为然。但

① 不知鉴翁是否为周瑞清?周瑞清字鉴湖,广西临桂人。咸丰己未(1859)进士,十一年(1861)十月由刑部主事入直,官太常寺少卿。人称其“鉴翁”,不知是否为同一人。

② 英敛之:《覆鉴翁先生辨学第一书》,载《益闻录》,1892年8月13日。

③ 英敛之:《覆鉴翁先生辨学第二书》,载《益闻录》,1892年8月17日。

④ 英敛之:《初使泰西记辨》,载《益闻录》,1893年3月8日。

⑤ 扬州教案是1868年8月发生在江苏扬州的一起影响较大的教案。当时,扬州的应考生员张贴揭贴,要求驱逐洋教。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W. H. Medhurst)得知发生教案,立即前往扬州交涉。英驻华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照会总理衙门,并要求英国派出海军力量,迫使南京地方当局接受要求。11月9日,曾国藩等清政府官员完全接受麦华陀的要求,罢免了扬州地方官,发表公告答应赔偿损失,保护教堂,惩治肇事者,邀请传教士返回扬州。

⑥ 志刚:《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2页。

⑦ 同上,第62页。

是当他领洗入教后,才发觉此书“诬毁教中者不一而足”。此时志刚已经去世,他想找其辩驳也找不到对象了,不由叹息:“长惜乎不能起志君于彭咸之居,如昔日之抵掌是非,求归至当也。”因为其他没有信教的友人仍然视志刚书中诬毁天主教的言词为“切论”,因此英敛之作《初使泰西记辨》一文,对志刚书中诋毁天主教的言论一一加以辩驳。如针对上述的“驳斥对中国的污蔑”篇,英敛之反驳道“此等言语,是犹饮狂泉不自知为狂,反指人为狂类也。且西人肯出多资交纳教士,必教士之诚信有以感孚之者,不然何有索必应,应且如向”,他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够“使人皆知其非,不复相沿谤毁”^①。

除驳斥鉴翁、志刚的观点外,英敛之在《论昏蒙为风俗之害》一文中,还分别驳斥了曾广钧、陶模和郭嵩焘的反洋教言论。英敛之痛心疾首地写道“率皆以洋人为公愤,不问事之真假、理之是非。一闻洋人好处则大怒,一闻诃诟洋人则大喜。曾太史广钧谓‘今士大夫避西人如九世之仇。’陶制军模谓‘士大夫以不谈洋务为高。’郭筠仙侍郎《罪言存略》论此鸷张昏愤情形尤为痛切。”^②

英敛之之所以对文人士绅的反教言论刻意加以辩解驳斥,主要是他意识到这些言论在广为流传过程中带来的影响力和杀伤力。自明末以来,捍卫儒家道统的文人士绅一直是反教主力,其振臂一呼的社会影响力不可小觑。正如台湾学者吕实强指出的那样“在许多教案中,从表面看起来,参加者常为成千成百的平民,但真正的鼓动与策划者,则多半为当地的官绅和知识分子……当时一般流行的反教书文、揭帖,极能激起一般民众对基督教的仇视与愤怒者,也都是出于他们的手笔。”^③

需要指出的是,英敛之虽然作了多篇护教文章,但是他只是对当时的反教言论加以驳斥,自己并没有对天主教教义作出任何解释,他也没有任何一部关于教义教理研究方面的著述。凡遇到友人向他问及此类问题,英敛之都会推荐相关书目,如《真道自证》、《盛世刍尧》、《万物真原》、《主制群微》等,以供其阅读。

此外,英敛之对文人士绅反教言论中关于教士、教民恶劣行径的描述并非完全不知,因为当时确实有一些传教士以及“吃教”的地方无赖飞扬跋扈、横行乡里,使平民百姓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受到损失和伤害,这种情况在华北地区尤其突出。因此,英敛之本人对于在法国保教权掌控下的中国教会状况亦十分不满,对那些在华包揽词讼、鱼肉中国百姓的传教士十分痛恨,希冀中国教会能够摆脱外来羁绊,自主传教。

三

英敛之虽然早年习武,能够“顽石可掇三百斤,弓能挽十二力,马步之射十中其九”^④,但是身体却不是太好。1884年,英敛之作《贫病吟》,言及自己长病善病,况味备尝,同时勉励自己要自强,“天降大任于是人,颠倒拂乱困其身。试看古来大豪杰,强半淬砺出奇贫。吁嗟贫病不须耻,善处益人反深矣”^⑤。1892年,在和友人的诗中,英敛之因多病流露出淡淡的忧伤,“久不拈吟笔,劳劳镇日忙。无才易索兴,多病自堪伤”^⑥。

① 英敛之《初使泰西记辨》,载《益闻录》,1893年3月8日。

② 英敛之《论昏蒙为风俗之害》,载《益闻录》,1897年6月19日。

③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绪言。

④ 英敛之《自序》,见《也是集》,天津大公报馆,清光绪33年(1907)。

⑤ 英敛之《贫病吟》,见《安塞斋丛残稿·安塞斋诗钞》,铅印本,1917年。另,《益闻录》(1891年1月28日)亦刊登了此诗,但略有不同。

⑥ 英敛之《率和秀珊夫子述怀韵用卷帘法》,载《益闻录》,1892年11月12日。

1893年,英敛之突然感到手足无力,这对他的打击很大。英敛之在日记中写道“嗟乎!此身多病,不耐微劳,学问一无所成,事业一无所就,此生徒此已矣!予向来志甚壮,不以贫贱动其心,自二十七岁忽患半身痿痹,不能观书作字,后虽少愈,但行不数里,便疲惫不堪,自分此生已矣!万念灰颓,毫无兴趣,纵有悬梁刺股之志,而身不自主,力不从心,奈之何哉!”^①该年,他在《益闻录》所载诗文亦反映了其落寞的心情,他写道“一年又见岁将除,悞我韶华几卷书。可自许时惟拙缪,最长人处是顽疎。多愁无计勘驱彼,善病行将恐负余。万缕千条紫绪候,此间悠闲问谁知。”^②

病中的英敛之既感怀于自己身体有疾,又感叹于国家多难。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每一位关心国家命运的人都似乎为忧愤与无奈的情绪所笼罩。英敛之由自己身体衰弱推及国家国力衰微,他为清政府居然不敌岛国虾夷的日本而感伤不已,希望国家能够早日警醒、求变求强,“折肱折臂忙无省,一败涂地知惊”^③。同时,英敛之对自己空有报国志向,却至今一无所就而惆怅不已。在致友人的诗中,他痛苦地写道“子独何为者?人皆弃敛之。显亲身困顿,干世学支离。玉树惭葭倚,赤心感腹推。怜才于世杀,使我泪淋漓。”^④

处于病中、身体较弱的英敛之一直对贫病之人特别关注,对他们富于同情心,这可能与其出身贫寒、一生多病有关。他在《乞儿行》一文中将富家子弟与贫穷乞儿作了鲜明的对比,“谁家豪华少年子,貂冠狐裘七宝车。哀求一钱半钱耳,追随相将二三里。不生矜悯反生嗔,讥呵豪奴鞭欲死”。社会等级差距带来的不公,使英敛之深恶痛绝,他认为“非此辈贤于彼也,地位使然耳。”^⑤

针对京城中乞丐较多的现象,英敛之指出这些乞丐并非全是不能干活的老弱病残,其中有一些是游手好闲、招惹是非之徒。这些人中“有强项之徒,流为盗贼,为非作歹”、“其弱者攫食于街,小窃于市”,英敛之对他们的做法虽然表示可恨可恶,但是也生怜悯同情之心,指责那些权贵豪强在安逸富足之余丝毫没有念及穷困贫病之人,可谓饱汉不知饿汉饥。英敛之认为即使国家极力施济也不过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西方国家在这点上的做法值得中国学习,他称赞“泰西各国安插穷民之事,法良意美,成效昭然。”

英敛之先后在《益闻录》发表了两篇关于安插乞丐的文章。在《论京中宜安插乞丐说》一文中,他叙述了乞丐的各种情形,但没有提及具体的安置方法。在《安插乞丐续说》一文中,英敛之不仅指出解决乞丐问题的重要性,还提出了效仿西方的具体办法,即“今日欲固本宁邦,必以安插乞丐为要。欲安插乞丐,必以开拓生产为急。苟能仿照泰西养民兴利诸法,实力为之,亦何至每年流离冻馁、委填沟壑者指不胜屈乎?果能令无业流民各执其事,得以自食其力,再加以工代赈之妙法,实为惠而不费、一举两得之事”^⑥。同时,英敛之认为乞丐们不应该对开荒修路等重活产生抱怨,他说“是虽不免开创艰难、经营劳瘁,然人生天地间先知先觉启迪后人: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不然何贵作之君师哉?”^⑦“君子劳心、小人劳力”语出《国语》,意思是人就该听从君主的天命,遵守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英敛之作为一名天主教徒,且又追求平等、自由,说出这样一番话,这不由使人联系到他的旗人出身和封建文人心理。

① 方豪编录《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188页。

② 英敛之《岁末感怀》,载《益闻录》,1893年11月1日。

③ 英敛之《安蹇诗存·久病吟》,见《也是集》,天津大公报馆,清光绪33年(1907)。

④ 英敛之《致毓君伯仁》,载《益闻录》,1894年6月2日。

⑤ 英敛之《论京中宜安插乞丐》,载《益闻录》,1897年7月17日。

⑥⑦ 英敛之《安插乞丐续说》,载《益闻录》,1897年10月13日。

四

19 世纪 70 年代末, “古老的官僚文化机构还在旧的传统轨道上缓缓地滑行, 仿佛是惯性, 一时还没有办法让这机器改变, 尽管可以加加油, 但机器已经陈旧; 相当多的文化人还在传统的生活轨道上继续着自己的活动”^①。这种情形下, 亲眼目睹中国处于种种危机压迫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寻求富民强国的途径, 传统儒学、佛学、西方宗教等都成为他们尝试改变中国命运轨迹的金钥匙。英敛之正是在这个时代大潮中, 选择了西方宗教及其思想, 并视其为挽救国家危机、兴国兴邦的巨大力量。

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 英敛之以护教为己任, 著文立说驳斥外界对教会的攻击, 希望时人不要将天主教与西方殖民划上等号, 只有将二者剥离, 才能心平气和、有效地学习西方; 作为一名中国奉教知识分子, 英敛之以心怀天下、心系国事为己任, 力主关心民生疾苦, 学习西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 变革以求新, 只有“推陈出新、兴利除弊”, 国家才能“由贫弱转至富强, 驾西洋而上之”^②。可以说, 英敛之已经把宗教精神转化为关心社会、关心大众的责任感了。

1898 年, 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维新变法运动, 英敛之积极为其呐喊助威, 希望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变法失败后, 英敛之恐被株连, 不得不逃离北京。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益加了解底层人民的疾苦, 形成更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 同时也促成其思想由早期的理论层面逐渐向实践层面转化。英敛之有感于“民富则国富、民智则国智、民强则国强”, 对中国人不看报、不关心天下大事痛心疾首, 希望能够以报纸开启民智, 使人知“各国兴替之由, 何利当兴, 何弊当革”^③。正因为英敛之抱着“宗教救国”的思想, 故而终其一生, 他一直践行这种理念, 积极创办《大公报》、直接参与到历次抵御灾害和赈济灾民的社会活动、努力筹建中国公教大学、大力推动中国教会的本地化等。

(责任编辑: 袁朝晖)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第 496 页。

②③ 英敛之《推广日报说》, 载《益闻录》, 1898 年 1 月 29 日。